



传统形上智慧与 社会人生的现代开展

——冯友兰先生“贞元六书”研究

邓联合 著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传统形上智慧与 社会人生的现代开展

——冯友兰先生“贞元六书”研究

邓联合 著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统形上智慧与社会人生的现代开展——冯友兰先生“贞元六书”研究/邓联合著.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0

ISBN 7-81047-998-9/B·20

I. 传... II. 邓... III. ①冯友兰(1895—1990)—哲学—著作研究②贞元六书—研究 IV. B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8577 号

-
- | | | | |
|--------|---|--|--|
| 书 名 | 传统形上智慧与社会人生的现代开展
——冯友兰先生“贞元六书”研究 | | |
| 作 者 | 邓联合 | | |
| 责任编辑 | 朱海榕 | | |
| 出版发行 |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 |
| 社 址 | 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 邮编: 210097 | | |
| 电 话 | 025-3598077(传真) 3598412(营销部) 3598297(邮购部) | | |
| 网 址 | http://press.njnu.edu.cn | | |
| E-mail | nnuniprs@publicl.ptt.js.cn | | |
| 照 排 | 江苏兰斯印务发展公司 | | |
| 印 刷 | 中国矿业大学印刷厂 | | |
| 开 本 | 850×1168 1/32 | | |
| 印 张 | 9.75 | | |
| 字 数 | 245 千 | | |
| 版 次 |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 |
| 印 数 | 1—670 册 | | |
| 书 号 | ISBN 7-81047-998-9/B·20 | | |
| 定 价 | 18.00 元 | | |
-

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

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

目 录

绪 论	在古今中西的交接点上:冯友兰与“贞元六书” 的历史使命·····	(1)
第一章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新理学》形上学的方法、立场与旨归·····	(17)
第一节	旨趣·····	(19)
第二节	源流·····	(27)
第三节	命题与观念·····	(33)
1	理·····	(34)
2	气·····	(60)
3	道体与大全·····	(75)
第四节	圣人·····	(91)
第二章	从乡村到城市:现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与社会发展 ——《新事论》的社会文化观念·····	(102)
第一节	创作机缘与思想前奏·····	(102)
第二节	《新事论》是《新理学》的应用?·····	(110)
第三节	中国人应当怎样做“城里人”?·····	(118)
第三章	中国传统伦理生活的现代样式 ——《新世训》对传统道德观念的改造·····	(130)
第一节	《新世训》在“新理学”体系中的独特地位·····	(130)
第二节	《新世训》作为独立文本的重要价值·····	(138)
第三节	理性及其局限·····	(146)

第四章 日常生活的理性超越	
——《新原人》的人生境界理论·····	(157)
第一节 “觉解”：境界之根·····	(161)
第二节 意义与境界·····	(175)
第三节 四境界理论的主要内容·····	(186)
第四节 境界·“觉解”·本体·····	(206)
第五节 精神境界与人生实践·····	(221)
第五章 在理性纯思的尽处：形上智慧的另一进路	
——《新言》的负的哲学方法论·····	(235)
第一节 晚出的负的方法·····	(235)
第二节 负的方法：从形上学观念返归形上学对象 ·····	(241)
结 语 ·····	(252)
附 文	
论“新理学”中的“觉解”思想·····	(259)
冯友兰“新理学”中“理”“气”范畴的问题与症结·····	(274)
冯友兰《新世训》新估·····	(286)
在境界、本体与人生实践之间 ——冯友兰人生境界理论的两处迷失·····	(294)
后 记 ·····	(305)

绪 论

在古今中西的交接点上： 冯友兰与“贞元六书”的历史使命

一

无论在人生经历还是在学术思想方面，冯友兰先生（1895—1990）都可以说是一个亦古亦今、亦中亦西的矛盾人物。言其“古”，是因为他出身于一个传统的耕读世家，其父因在晚清的科举考试中获得功名而当上县令，最后死在任上；言其“今”，他早年求学于“戊戌变法”的产物——北京大学，既而赴美国留学，回国后又长期任教于“洋味”十足的清华大学，1949年之后高寿的冯友兰先生还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在“中”的方面，他童蒙初启时诵读的是子曰诗云一类的儒家经典，而在晚年他的思想又回归到了中国哲学上来，直至临终时还高呼“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至于“西”的方面，冯友兰最初是因为对西方逻辑学情有独钟而选择以研究哲学为终身事业的，并且当时他选择进北大哲学门的本意就是为了研习西方哲学，后来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时又深受柏拉图主义的新实在论影响；在学术方法上他则极力倡导西方哲学正统的逻辑分析法。金岳霖先生认为，在冯友兰的哲学思想中，中国和西方的成分各占其半——其实何止其学，其人亦是如此。

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冯友兰先生可以说是为数不多的几个

身兼哲学史家和哲学家双重身份的思想巨人之一。一方面,他运用现代学术方法完整系统地梳理、诠释了中国哲学的演变历程,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研究以及独立的“中国哲学”学科型制的创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从而成为深入推进中国哲学研究“可超而不可越”(李慎之先生语)的必经阶梯;另一方面,学贯中西的冯友兰又基于自己的缜密分析和判断,择取中国古代哲学和西方哲学优秀的主流传统,以继往开来的精神把二者有机地融贯为一,创立了独特深邃且涵涉甚广的哲学思想体系。先生晚年自述其一生的学术活动时,曾有“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一语,这句话后来以甲骨文刻在他的墓碑上。所谓“三史”,指的是冯友兰先后撰写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三部著作:《中国哲学史》(1934年,2卷)、《中国哲学简史》(1948年,1卷,英文)、《中国哲学史新编》(1991年出齐,7卷),它们分别体现了著者在不同的思想阶段上对中国哲学的通透理解;而所谓“六书”,则是指冯友兰在抗日战争期间颠沛流离的近十年中先后出版的六部哲学著作:《新理学》(1939年)、《新事论》(1940年)、《新世训》(1940年)、《新原人》(1943年)、《新原道》(1945年)、《新知言》(1946年),这六部书后来被冠以“贞元六书”的总名,它们构成了冯友兰“新理学”的完整哲学思想体系。

人们总是在当下切近的场景中对生活世界的变化做出自己直截具体的回应,哲学家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哲学家在应对生活世界的巨变和挑战时,能够超越当下情境中琐屑细节对于经验的一己小我之拘限,自觉地置身于民族精神生活的宏阔历史时空中,调用某种为他所认同的传统思想资源,通过创造性的诠释和转换工作,为该民族未来的文化发展开辟一条新的可能路向,提供一种新的样式,甚至开辟出一片新天地;哲学家本人也因此成了这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精神生活上的“立言人”或者“创言人”。虽然哲学家的个人思考总是有着相当的前瞻性和总体性,但其思想创造活动所处的深刻历史机缘和性质,以及他的思想成就所具有的深

远历史意义,却往往总是在思想家的晚年呈现得更为完整、清晰,也更为强烈、自觉。因此,虽然本书探讨的对象是冯友兰先生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通过“贞元六书”创建的哲学思想体系,但是这里我们不妨首先把目光转向先生的晚年,看看著者本人是怎样概括评估其一生的哲学创造活动的。

1982 年夏天,87 岁高龄的冯友兰到美国访问。在他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学位的仪式上,冯先生发表了一篇重要的答词。笔者认为,这篇答词对于我们确当地理解其哲学思想的历史性动机、性质和意义,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冯友兰说:“我生活在不同的文化矛盾冲突的时代。我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这种矛盾冲突的性质,如何适当地处理这种冲突,解决这种矛盾。又如何在这种矛盾冲突中使自己与之能适应。”^①这里所说的文化矛盾就是 20 世纪初期冲突达到最高潮的中、西方文化的矛盾,这个空间意义上的矛盾后来被冯友兰在《新事论》一书中归型为线性的时间维度上的古代与近代文化的矛盾。基于中西文化差别实为古今新旧文化矛盾的实质性判断,冯友兰终其一生哲学思考的中心问题就是找到一种恰当的方式,解决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在这个漫长曲折的思想旅程中,虽然冯友兰不同历史时期学术活动的重心存在着差别,虽然他也曾经在甚至存在着巨大反差的各种学术观点上左右摇摆、进退失当,并因此而受到来自于“庙堂”或“士林”的赞扬或谴责,但从总体上说,冯友兰始终都清醒地恪守着如何解决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这个根本问题。也正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冯友兰的哲学创造活动不仅是他作为一个生命个体之内涵的丰富绽开,而且更可以被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天崩地裂的“两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如何应对西方或近代文化的巨大挑战,以探索出一条实现民族精神自救和自

^①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 年,第 362 页。

新之路的历史性事件。换言之，冯友兰先生是中华民族续绝存亡之际传统文化怎样获得新生之历史使命的一个自觉担当者。

同样在这篇答词中，冯友兰指出如何解决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问题，“又进一步表现为如何继承精神遗产的问题”^①。这表明他解决中西文化冲突问题的立足点是中国传统文化，而他要完成的具体任务就是怎样承续其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成分，并且通过积极的改造和转换，尝试着把它从古旧的过去提升到崭新活泼的现代阶段上来。

无疑，冯友兰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充满着深情和自信的，他在晚年曾多次引用《诗经》中的两句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来表明这种自信心。在他看来，“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虽然已经过去了，但它也是中国新文化的一个来源，它不仅是过去的终点，也是将来的起点……新旧结合旧的就有了生命力，就不是博物馆中陈列的样品了；新的也就具有了中国自己民族的特色。新旧相续，源远流长，使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放出新的光彩”^②。冯友兰在答词中的这段表述其实早在1946年他为西南联大所撰写的纪念碑文中就早已成型：“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③作为实现民族文化创新之历史使命的自觉担当者，冯友兰说：“我的努力是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而又同时促进实现新命。”^④具体而言，“就是把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有永久价值的东西，阐发出来，以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养料，看它是否可以作为中国哲

①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365页。

② 同上，第369页。

③ 同上，第355页。

④ 同上，第367页。

学发展的一个来源”^①。

冯友兰认为,中国古典哲学中最有现实意义的是其人生哲学部分,它“对于人类精神境界的提高,对于人生中的普遍问题的解决,是有所贡献的。这就有永久的价值”^②。而他所做的,就是从现代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语境出发,借助西方理性主义分析方法重新阐发中国传统哲学的人生精神,以使之在学理上获得新的合法性,在现实中具有不竭的生命力,从而为人类精神生活的进步做出贡献。

冯友兰一生中经常借用宋代大儒张载的名句励志自许:“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充分表明了冯先生对中国哲学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念以及他甘愿为之奉献终生的非凡气度。作为一代“文化托命人”,冯友兰继往开来、承接再造中国哲学人生精神的卓绝心力完整地体现在他的“贞元六书”之中。

二

冯友兰首先是以哲学史家的身份立足于学界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写作不仅奠定了他在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且为他进而转向融贯中西思想的哲学创造活动提供了充足的学术准备,打下了厚实的基础。冯友兰说:“在四十年代,我开始不满足于做一个哲学史家,而要做一个哲学家。哲学史家讲的是别人就某些哲学问题所想的;哲学家讲的则是他自己就某些哲学问题所想的。……到四十年代,我就努力使自己成为近代中国哲学的创作

①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370页。

② 同上,第370页。

者之一。”^①这是冯先生晚年对于自我学术兴趣转移动机的平和表述，而实际上一旦开始具体探讨“贞元六书”的创作和“新理学”哲学体系的构建，我们的思路就不得不回到那个民族危亡、战火纷飞的动荡年代。

“贞元六书”虽然酝酿已久，但落笔写作却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中华民族灾难最深重的西南联大时期。从第一本书《新理学》完稿到最后《新知言》的出版，其间的八年恰好是冯友兰随学校迁徙南渡、漂泊流亡的八年。背负着中华民族水深火热的沉痛灾难，冯友兰表现出了一个学者本应有的现实关切情怀，如他在《新理学》之“自序”中所说的：“此书虽‘不着实际’，而当前有许多实际问题，其解决与此书所论，不无关系。”书中的哲学思考虽然玄远虚旷，但冯友兰却希望它“对于当前之大时代，即有涓埃之贡献”^②。在《新世训》完成时，他又把这种现实关切的指向表述得更明确：“我国家民族方建震古铄今之大业，譬之建室，此三书者，或能为其壁间之一砖一石欤？是所望也。”^③与其他职位上的人不同，哲学家总是通过思想活动的特殊方式参与现实生活。概括起来，冯友兰创作“贞元六书”的目的即在于“以志艰危，以鸣盛世”^④。

之所以把这些著作命名为“贞元之际所著书”，冯先生解释说：“贞元者，纪时也。当我国家民族复兴之际，所谓贞下起元之时也。”溯其本源，《周易·乾卦》有所谓“元亨利贞”的说法。宋代理学家程颐解释道：“元者，万物之始；亨者，万物之长；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物之成。”（《周易程氏传》）所以，“元亨利贞”四字可以理解为万事万物经由开端、通达、顺利而最后至于正固终结的完整

①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364页。

② 冯友兰：《贞元六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页。

③ 同上，第373页。

④ 同上，第3页。

发展过程。从万物生生不息的宏观角度说，“贞”既是事物前一个变化过程的终结，同时又是其后一个新生发展过程的开端，此所谓“贞下起元”。冯先生以此为其书命名，一方面表现了他对于中华民族虽堕艰危但将来必然再度复兴的坚定信念，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承继传统、立足当下、朝向未来的强烈的历史参与意识。

作为一个视野开阔的哲学家，冯友兰积极参与并推动历史变革的具体方式，就是在民族危急的历史关头通过对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生活进行全面、深刻的总结反省，“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以为人们探索、建构起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理解世界的根本方式和建基于其上、具有崭新生命力的人生精神，实现他“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作后薪”^①的深衷宏愿。此诚赤子拳拳报国之心也。

虽然把一个民族所遭遇的全部历史命运的最终原因一概地追溯、归结到其文化传统层面上的做法是极为片面、偏颇的，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一个曾经长期领导历史潮流的伟大民族从高峰衰落到其命运的低谷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肯定在其深层的内部出了些问题。“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所以，能否发现、直面这些问题，并且主动进行文化生活范式的自我变革，是观察和决定一个民族是否具有自新能力的重要标志。抗日战争时期可以说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走向衰落的历史“谷底”。在国破家亡的惨痛现实面前，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全面深刻的反思、再造，是摆在那些真正具有民族尊严和历史责任感的思想家面前的紧迫问题。

即使抛开这种现实的紧迫性不论，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我们也有义务把华夏先贤创造的灿烂文化和优秀思想继承并发扬光大。因为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内在基因，文化

^①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368页。

的式微或者蜕变为一种死化石般的存在,实质上意味着民族命运的终结。这里的关键问题是继承传统思想中的哪些成分,又怎样把它们发扬光大?作为一个深受西方新实在论哲学影响的思想家,冯友兰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最为认同并着力再造的是宋明道学中的程朱理学一派。他具体处理程朱理学的方法是“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冯友兰的意思是,“照着讲”是简单重复程朱本来的思想,不做革新;“接着讲”则是应用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吸取柏拉图主义的新实在论思想,以改造程朱理学。所以,冯友兰“贞元六书”构成的“新理学”体系,“亦有与宋明以来底理学,不大相同之处”^①。

利用“接着讲”的方法,冯友兰苦心营造了一个虽旧而实新的哲学思想体系,它“上继往圣”,因源传统,同时又汲新纳异,“下开来学”。冯先生期望他的融合中西思想精华的“新理学”是一个符合现代文化范式要求,能够打通传统与现代,并且具有“全新”力量的“较新”哲学体系。^②

那么在“贞元六书”中,中与西是否得到了妥帖的融合呢?传统与现代是否被顺畅地打通了呢?在应对现代生活的诸多崭新问题时,冯先生的“新理学”思想体系是不是因此而具有了“全新”的力量呢?

三

如上文所说,“贞元六书”构成的是一个涵涉甚广的哲学思想体系。分而言之,《新理学》营造的是一个以“理”范畴为核心的形上本体结构,《新事论》探讨的是现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文化发展

① 冯友兰:《贞元六书》,第5页。

② 同上,第20页。

问题,《新世训》提供的是一套现实伦理生活的法式,《新原人》的核心内容是人生境界理论,《新原道》概括揣摩了中国古代哲学“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基本精神特征,《新知言》阐发了“正”与“负”两种哲学方法。这六部书合起来构成了“新理学”的哲学体系。既为体系,那么如何从学理角度公正全面地审视、评价它呢?冯友兰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说法是:“这六部书,实际上只是一部书,分为六个章节。”“《新理学》这部书是我在当时的哲学体系的一个总纲。如果把六部书作为一部书看,《新理学》这部书应该题为‘第一章:总纲’。”这个譬喻表明了冯先生对待“贞元六书”的一个基本判断:六书构成的是一个内在结构完整致密的思想体系。对此,冯先生始终是充满自信的。他在晚年还说:“新理学这个名字,在我用起来,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是指我在南岳、蒙自所写的,商务印书馆 1939 年所出的那部书。另外一个意义是指我在四十年代所有的那个哲学思想体系。以下用不同的符号表明这个区别。以《新理学》表明前者,以‘新理学’表明后者。”^①如果把著者本人的自我判断暂且搁置,那么我们可问:由“贞元六书”构成的这个“新理学”体系究竟是不是一个内在结构相对致密严整的哲学体系呢?其中到底有没有深刻的理论矛盾或困难存在?

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近些年来大致上有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

早些年的一些学者大体认同冯友兰的自我评价。例如,陈岱孙先生讲:“我以为,这不是六部书,而是一本书的六章,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②久治“冯学”的田文军先生也说:“严格说来,冯友兰的新理学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应当是涵括‘贞元六书’

^①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 246 页。

^② 陈岱孙、季羨林、张岱年等:《冯友兰先生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序。

的全部内容的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新理学》一书作为‘讲理之学’，实际是冯友兰新理学体系的一块理论基石，是冯友兰讨论社会人生问题的形上学依据……《新理学》是新理学体系的一个总纲。”^①张岱年先生说得更明确：“冯先生的《新理学》条理缜密、理论严整，确乎成一家之言。”^②同冯友兰一样，这些学者都是以《新理学》的形上系统为基础来判定“新理学”理论结构的完整性的。

与此不同，也有学者独辟蹊径，把《新原人》的人生境界理论视为“新理学”体系的核心，并且站在这个角度上去理解整个体系的严整性。例如，冯先生的弟子涂又光认为：专讲人生境界论的《新原人》是“贞元六书”的中心著作，“《新理学》是为《新原人》提供形上学基础，《新事论》是为《新原人》提供文化学根据，《新世训》是为《新原人》提供初级生活方法，《新原道》是论证《新原人》在中国哲学史的地位，《新知言》是论证《新原人》在世界哲学史的地位”^③。

无论上述学者观察、处置“新理学”的手眼怎样不同，其基本立场还是较为一致的：“新理学”的理论体系是完整严密的，其间不存在根本性的理论矛盾和问题。

与这些肯定性的观点相反，随着对冯友兰哲学思想研究的逐步深入，近年来另有更多的学者分别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提出，冯友兰自认严密的“新理学”体系其实并不严密，而是存在着众多不可解决的理论难题和无法弥合的根本缺陷。

例如，郭齐勇认为：“我们与其把贞元六书看作一个严密的‘新

① 田文军：《冯友兰新理学研究》，武汉出版社，1990年，第98页。

② 张岱年：《冯友兰哲学思想的转变给我们的启示》，载于《高校理论战线》1991年第2期。

③ 冯钟璞、蔡仲德编：《冯友兰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46页。

理学’体系,毋宁把它们看作一条章鱼,松散的而不是致密的。”^①乔清举通过解析“新理学”体系发现,“其间存在着结构的二元化问题。也就是说,新理学的各个部分不是用一个统一的、一以贯之的原则,而是用了两个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具体地说,形上学中存在着逻辑与事实的矛盾;文化观中存在着‘西体中用’与‘中体西用’的矛盾;人生哲学中存在着价值中立与价值判断的矛盾等”,这些都是“新理学”体系固有的重大矛盾。^②杨国荣认为,冯友兰在《新理学》中构筑的“本体世界完全与时间绝缘:它基本上处于逻辑的平面之中”,人的存在也因而被施以了一种“逻辑的处理”;而在《新原人》的“人生境界说中,人的存在既是逻辑的,又超越了逻辑:人生的不同境界既是以觉解为根据的逻辑划分,又渗入了时间之维而展开为一个历史性过程”^③。言下之意,人的逻辑存在与人的“既是逻辑的,又超越了逻辑”的存在,其间的矛盾对立如何解释,又如何解决?郑家栋更进一步指出,《新理学》自然观的“基本精神更接近于两分式的西方哲学”,而《新原人》、《新原道》所阐发的主观境界和人生哲学“则更多地反映了中国哲学的特性”^④;再从动态的角度看,“作为一个体系的发展过程,《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等书的写作出版,不仅意味着对《新理学》一书之哲学观念的运用、补充和发展完善,而且包含了在某些方面对《新理学》的扭转、修正和超越。这就使得由‘贞元六书’所建构的哲学体系中包含了巨大的理论矛盾和内在张力。所以,只

① 郭齐勇:《评〈冯友兰新理学研究〉》,载于《孔子研究》1991年第3期。

② 乔清举:《新理学的解构与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载于《哲学研究》1996年第2期。

③ 杨国荣:《存在与境界——冯友兰新理学本体论的内在向度》,载于《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

④ 郑家栋:《冯友兰与近代以来的哲学变革——新理学的基本精神及其限制》,载于《哲学研究》1991年第12期。

是把《新理学》一书与其他诸书视为‘总纲’与具体展开部分的关系(如冯先生本人所言)至少是不全面的”^①。程伟礼也说,冯友兰关于《新理学》与其他诸书的关系是“总纲”与章节关系的“这一譬喻是跛脚的,并不妥帖”^②,因为从其内在的逻辑关系上看,《新理学》体现了西方新实在论的本体立场,而从《新原人》开始,冯友兰已经“逐渐转到中国哲学方面”来了。^③

在“新理学”体系内部,尤其是在其中的形上学与人生哲学之间存在着理论断裂,目前已经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笔者通过仔细研读解析“贞元六书”,基本上认同这个学术共识,并且把“新理学”体系内部的理论断裂概括为本体与境界的断裂。基于推进“冯学”研究之目的,接下来的问题应当就是怎样理解这种理论断裂——它的产生根源与理论实质是什么?作为哲学史上的一个思想个案,它的理论意义何在?放到古今交汇、中西融贯的宏大历史语境中,“新理学”体系中的这个理论断裂又在向我们昭示着些什么?

1931年,冯友兰在当时《大公报》的《世界思潮》副刊上连续发表了几篇《新对话》;1937年,他又在《哲学评论》上发表了《哲学与逻辑》一文。“在这些文章中,‘新理学’的主要观点已有了萌芽。”^④如果从此时的酝酿阶段开始算起,一直到1946年《新知言》的出版,整个“新理学”体系从初创到最终完成,冯友兰整整用了15年时间。应当说,在这15年中,冯友兰的哲学思想发生一些变化乃至重大转折也是极为正常的。换言之,“新理学”体系的内在断裂也正是在这个动态的思想创造过程中萌生、展开并得到彰显的。

① 郑家栋:《本体与方法》,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11~112页。

② 程伟礼:《信念的旅程——冯友兰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42页。

③ 同上,第145页。

④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246页。